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7新兴经济体论坛会议论文综述

李景睿　赵婉婉

（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在新兴经济体论坛创立五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汇聚新兴经济体政府、学术、企业、社团、媒体等各方力量，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与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联合举办以“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7 年会暨 2017 新兴经济体论坛”，共同探讨新兴经济体发展现实与前景。

本次论坛由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工业大学主办；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战略支持；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校友会协办；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广州市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研究中心承办。为了丰富此次论坛内容，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在 2017 年 2 月至 10 月间，组织了面向国内外公开征文活动。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外交学院以及欧亚开发银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巴西利亚大学等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论文 157 篇。

会议论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新变局与新兴经济体新前景，主要关注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新变化，国际产业、技术变革新趋势，国际经济新秩序与新兴经济体新前景等；第二，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态及前景，聚焦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分析新兴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现实困境、基本尝试和具体做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理论、政策及实践，主要是总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理论上的演进和探索，政策层面的执行及相关实践，从理论认知、实践探索、政策设计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第四，金砖国家合作深化与可持续发展，主要分析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机遇与挑战，为合作深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库方案，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发展借鉴，为全球经济提供新动能。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全球经济新变局与新兴经济体新前景

2017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世界经济上行趋势明显增强，并上调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报告也指出，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尚未完成，相当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同时，全球性问题加剧，“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新兴经济体发展与合作面临新的环境。

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快速形成。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袁志田和南京财经大学的袁洁薇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一个多元主导、平行分工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体系。由于相似的发展目标与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平行分工体系能够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同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的差异，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规则问题，这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时，新兴经济体自身的贫富分化、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也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前景的不确定性。

学者们强调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共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孙振宇对战后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重点指出其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有失公平，但从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战争，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尽管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生命力，新兴经济体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孙瑾和封于瑶从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质量）高能更有效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且在发达国家中影响更为明显，这也是发达国家在新时期推进新一代贸易协定规则的原因，而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执行能力在新的规则下签订 RTA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指出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可持续性更取决于结构性因素，事关各国经济利益，各经济体应携手应对，实现平衡增长。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李林玥探讨了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产业内贸易结构及国际政策协调。

学者们普遍肯定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邹志强指出中国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并不断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努力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也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和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路径。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罗成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院肖康康探讨了中国经济

发展新模式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引领。南京政治学院谢浩指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全球化的环境是始于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市场的当代表现。如何“把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中国在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有更多属于自己的定义。辽宁大学张志明考察了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福建社会科学院杜强探讨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策略，指出中国应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主动担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主导者角色，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辽宁大学张志明从价值链联系和价值链地位横纵两个维度对亚太价值链进行全面解构，并重点考察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韦晓慧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分析了中国 FDI 对非洲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二、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态及前景

2016 年 1 月，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生效。新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今后 15 年实现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发展是新兴经济体的第一要务，新兴经济体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 议程的制定标志着人类对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从三个维度为可持续发展设定了宏伟目标，即通过善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外交学院张蛟龙指出在实施 2030 议程中要不断寻求金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增加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而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四川外国语大学谌华侨基于战略对接的视角对中国和巴西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巴两国有必要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分享各自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实现联动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关雪凌，祝明侠探讨了新兴国家外债风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林跃勤在比较金砖国家等主要新兴国家群体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探索其完善风险治理能力及合作能力建设思路，以保证各自的稳健持续发展与合作共赢。

部分学者关注制度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西南财经大学霍伟东，陈若愚探讨了制度质量、多边金融机构支持与非洲 PPP 项目成效问题。湖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张耀坤，侯俊军，相均泳采用构建全球治理制度供求模型的方法，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供求现状为基础，探讨制度供求变化所反映出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问题。提出新兴经济体应加强合作，推动制度改革；并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积极进行制度创新的路径建议。辽

宁大学陈本昌通过对道格拉斯·诺斯，张宇燕，德隆·阿西莫格鲁三人对制度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和动力。上海财经大学林珏，彭冬冬政府职能转变对贸易便利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广东工业大学吴小节，谭晓霞，曾华基于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 Renata Thiebaut 探讨了国际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Badar Alam Iqbal, Farha Naaz Ghauri 印度的税收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备受关注。西南财经大学孙楚仁，刘雅莹以外交伙伴关系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并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目录”在实证方面证明了伙伴关系能够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对那些伙伴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河北大学马文秀，孟彤探讨了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及潜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聂聆，陈诗文文通过解构 2001 年和 2014 年亚太国家（地区）主要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并计算 GH 指数，研究中国在亚太各国价值链中的地位。指出中国对亚太国家（地区）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贡献大幅提升，对多数亚太国家（地区）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贡献已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在亚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价值链中，中国的地位提升幅度较大，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拉近。因此，中国在亚太价值链竞争中具有较大的优势，中国重构亚太价值链有着坚实的基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Pierre van der Eng 探讨了 2001-2016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失衡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Ming YE 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出口产品价值链提升路径问题。

区域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福建社会科学院林发彬探讨中国—东盟“五通”建设与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浙江科技学院潘莉，孙泽生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基建关联产业的出口潜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郑腊香指出中欧新能源合作是中欧应对气候变化、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它有利于化解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误解、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互促进、可强化对“一带一路” 建设的金融支持并且能促进“一带一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新疆财经大学高洋探讨了中国企业参与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广东工业大学何锡阳探讨了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及其前景。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重视各国的结构调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探讨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指出在体系变革上，

应通过新旧机制的互补与相互促进优化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依托力量上，应大力培育支持力量，提升中国经济主张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平台建设上，应充分发挥务实机制的作用，提升中国的议题磋商和规则谈判能力；在议题设置上，应坚守经济发展主线，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的议题主导能力；在风险防范上，应积极参与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提升中国的系统性风险掌控能力。上海大学江时学探讨了拉美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凡，许昕，代永玮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以全球创新能力最具代表性的 34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家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南开大学郭金兴，冀承从增长绩效与适应性效率的角度考察马来西亚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广东工业大学李景睿，李敏仪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数据分析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对高等教育地区差异的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姜巍基于现代巴罗内生增长模型框架，运用东盟 7 国 1993~2015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 Sys-GMM 方法，实证考察东盟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湖南商学生延超，周玉姣探讨了适宜要素、分工与后发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三、“一带一路”：建设理论、政策及实践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兴经济体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契机。4 年以来，很多新兴经济体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同中国达成了一系列“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新兴经济体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学者们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蔡宏波，车茂立将马克思的两极相连预言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相联系，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一带一路”，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三个方面明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极大丰富。中国人民大学黄剑和黄卫平认为，项目对接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起点，对于中国疏导丰裕产能、实现中国资本“走出去”有着重要意义。深圳大学郁龙余提出用“民为邦本”、“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大同”五大理念指导“一带一路”建设。他认为，“一带一路”将是友谊之路、和平之路、幸福之路，它必将开创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广东工业大学蔡春林指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可逐步将世界经济带入复苏轨道，

将全球关注焦点引向发展问题，并将开创全球经济“嵌入式”治理新模式。上海台湾研究所周忠菲和德国鲁尔波鸿大学鸿波指出，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作为中国掌握区域经济体系建设的主动权，加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平台。广东工业大学姜新海反思了全球治理中令人关注的诸多难点，并提出了建立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思路。宁波大学白泉旺基于世界经济联动增长的特点与内在要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经济联动增长特征具有耦合性。认识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有助于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联动增长所做的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在规避风险方面彰显了中国主张。上海社会科学院胡键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宗教风险、文化风险、民族种族风险、地缘风险和项目风险等。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强大的能力基础等，它一定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华南理工大学谢加书和蔡东丽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国际合作破解三大赤字的中国方案。北京建筑大学张国和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沿线国家和国内相关省份的研究、多学科的研究以及对外的合作与交流都需要加强。广东培正学院井百祥指出，“一带一路”工程的实施，既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物质批判，也是文化的批判。在带动东西方物质和文化的交融中，实现理念的超越和思维的转型，把中华文化的科学性带入发展过程，以公利公益性文明意识弥补功利主义文化之不足。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庆基于历史、政策与现实维度进行了分析，作为当今中国的顶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拉美的对接具有历史、政策和现实基础。

在实践方面，“一带一路”为推动沿线经济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宝荣认为，基于非洲市场环境和产业链特点，非洲国营企业应是中国“一带一路”下产业合作的重要对象。产业合作对接非洲国有企业是实现中非合作战略目标，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华南农业大学杨学儒和广东工业大学李军以广东海大集团为例，剖析了企业国际合作（创业）的战略选择、实施过程和后果，总结了其特点、经验和挑战，为企业国际合作（创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黄满盈与邓晓虹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跨境交付的金融服务贸易，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国家和地区都缺乏竞争力。广东工业大学杜健民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到平均外国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成都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龚

静和尹忠明以典型新兴大国——中国为代表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温州大学曹瑞冬根据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东南亚三国造成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的优势与弊端，并总结出各国在此战略下应秉承的态度。广东工业大学张姗对我国 2011 年-2015 年间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湛江市广播电视大学和广东海洋大学周烨、高维新和王幸福聚焦湛江市海洋产业，发现湛江的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对策，为促进湛江市海洋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此外，在加强各国经贸合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姜英梅指出，伊朗经济发展的两大结构性矛盾以及美伊关系和伊朗地缘政治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使得伊朗经济发展仍面临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伊朗未来经济发展对中伊共建“一带一路”不可避免产生影响。暨南大学张珺和钟湘玥从增加值贸易核算的角度重新度量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贸易状况，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额普遍比传统贸易核算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馨蓓和黄亮雄采用 2003-2013 年 64 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效应。暨南大学陈章喜分析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得出：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结构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也有很大的互补性，相互间贸易品种较多，中国向南亚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南亚对中国出口以初级品和半成品为主。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党校李霞和上海海洋大学廖泽芳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东道国主体，对中国对外投资（OFDI）的区位分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冯阔和周俊男通过构建 DSGE 理论模型，分析了贸易冲击对个体教育决策、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上海大学斯庆和何树全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最终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进程要高于参与区域内分工的程度。

四、金砖国家：深化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金砖国家经历了一个较为艰难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阶段，致使国际上“金砖褪色”的论调不时出现。金砖合作是探索南南合作新机制的重要内容，探索金砖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制度化，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探索新的道路，促进共同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亟待创新经济联系与合作机制，通过善治实现经济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关秀丽对金砖国家机制提出以下四点：强化规制协调意识，凝聚制度合作共识；加强“创制能力”建设，夯实制度竞争基础；把控规则制定权，抓住制度治理之核；善用国际合作舞台，丰富规制协调实践。华南农业大学熊启泉从金砖国家与全球经济联系的视角考察了各国经济发展绩效差异，他认为，要从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高度的巨大差异出发，在产业链层次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以减轻全球资源价格波动对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负面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彭越和海南师范大学田中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通过动态模型对中印两国的政府绩效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绩效明显高于印度，同时，中国比印度更深入的融入全球价值链。河北大学裴桂芬对俄罗斯转轨初期去工业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他认为俄罗斯的去工业化是源于其特殊的贸易结构和休克疗法的改革计划。嘉应学院游春晖和王菁对印度环境审计实践作了深入分析，并结合我国环境审计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定环境审计指南、加快环境审计研究和人员培训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欧亚开发银行 Yaroslav Lissovolik 认为创建“金砖+”是克服金砖国家发展局限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深入研究各国发展需求，制定差异性政策，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霍建国对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前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中国应当承担起推动合作发展的重任，在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加强经贸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次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整体竞争能力，推动金砖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探索南南合作的新机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和胡贝贝为深化金砖国家经济伙伴关系提供了可行的“路线图”：即“一带一路”与金砖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硬件基础设施对接实现“陆海空大联通”；软件基础设施对接实现“一体化大市场”；经济伙伴关系的融资保障实现“多层次大流通”。广东工业大学蔡春林认为金砖国家应保持战略互信和定力，以强化内部关系为基础，深化和做实现有合作机制。同时，金砖国家应奉行开放的合作主义，探索以“金砖+”方式，整体统一对外进行同心圆环式合作，与现有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平台积极开展互动。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和陈燕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昆明理工大学从东道国和投资国两个维度研判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构建基于包容性视角的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策略。广东工业大学李方超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贸易结合度指数对中印两国贸易的竞合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国际事务秘书处 José

Nelson Bessa Maia 认为，金砖国家有能力通过成员国之间坦诚对话解决分歧并建立信任感，也有能力一起加强经济互动、共同增长。

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福建社会科学院李鸿阶和黄启才认为，加强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全球化发展、金砖合作机制建设、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应把金砖国家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的心脏起搏点和着力点，要全方位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金砖国家自贸区网络建设，然后逐步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民族大学王绍媛、李国鹏 以及汪文亮以金砖国家为视角，基于改进的 RCA 指数探讨金砖国家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经济可行性。他认为在金砖国家构建 RVC 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考虑以下因素，有效平衡 GVC 和 RVC 双环流、继续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步加强金砖国家多层次化互联互通、探索建立金砖国家 RVC 绩效评估体系、尝试发挥中国的主导效应等。江西师范大学骆嘉提出，推进金砖国家资本市场更深层次的交融合作，应有效化解不利影响，增强资本市场开放可持续性；开拓新兴合作领域，激发资本市场合作内生动力；创新跨境合作机制，深化交易所联盟的务实合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蔡彤娟和郭小静的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对金砖国家 FDI 流入量的影响显著性不同，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也不尽相同，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投资产业、投资环境等有很大差异。广东工业大学李洁玲对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青岛大学阮红伟通过变异系数法对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排名评价，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研究金砖国家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莫斯科国立关系研究所 Irina Yarygina 和 Galina Panova 指出金砖国家都具有政府对银行业进行重大干预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这些国家在 2007-2009 年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

五、总结

总体而言，论文的主流观点认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 2016 年的低迷不振之后，2017 年开始复苏，2018 年增速有望加快。但是，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共识正在减弱，政策重大转变导致全球失衡扩大、汇率变动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移民限制新政出台等将严重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地缘政治风险和各种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需要积极化解相关风险，做好预期管理，向世界传递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的信心，以推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加强合作，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将可持续发展推向深入，引领新兴经济体平稳发展，为全球提供发展经验和增长动力。